

## 中共中央关于布置抽调 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

依照目前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今年内除实现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九省外，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以上七省，除青、宁为小省外，粤、桂、川、滇、黔五省如第一步只占领其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则总共所需筹派干部约计三万八千人。根据中央辰陷所指示的筹派原则，兹作如下布置：

(一) 西北宁、青两省及甘肃部分地区，大约需要准备五千个干部。原来决定派往西南的三千老干部，除抽出一千（县级以上干部约二百人）给四川外，其余两千留西北本身调用。另从华北局抽调三千个经过初步训练的大中学生给西北。

(二) 川、黔两省大约需要一万六千个干部，主要由华东局负责照下述办法解决：（甲）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约三千老干部全部交二野。（乙）二野用在南京市的三千个干部可抽出一部去川、黔，具体数目由华东局商定。（丙）从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抽出一部分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连同（乙）项共应调足二千人（县级以上干部约三百人）。（丁）从京、沪一带招收训练六千个工人、职员及大中学



生成分的新干部。

其次，由各中央局负责解决一部分：山东分局抽调二百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一千个新干部；华北局（包括中直）抽调五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四百人），一千个新干部；东北局抽调一百个县级以上老干部；西北局抽调一千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约二百）；华中局将现在中原的川干队三百余人抽回四川，其余不足之数由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

（三）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一万七千人，由以下几方面负责筹派：（甲）原派华中之李楚离队两千九百人（两千二百老的和七百新的），现在不要分散，应全部用于上述三省；另由华中各省抽调七百老干部；武汉训练三千新干部；再从南下工作团的一万及华北局补充武光队的两千学生中抽调四千人。（乙）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丙）由东北局调派四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二百人）。华北局调派三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一百人）。（丁）其余不足之数由四野部队干部中（包括两广纵队）抽调。

（四）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不带孩子、身体较好的女干部亦应注意抽调）。凡熟悉各该省情形而又能抽出者，均应抽出派回。

（五）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老区一般县区干部均已削弱，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在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后，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大量召集训练培养并团结本地干部，以便逐渐推广占领区。

（六）对于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的招收、训练工作，各



局应即着手加紧办理，争取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训练时间。

（七）所有老干部一般的应着重从城市中或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勿使县区干部再形削弱。并限于七月底征调齐全，分别集中在各中央局或分局进行训练，听候调用。

（八）各中央局、分局接到本指示后，应即召集会议连同中央宸陷指示合并讨论，定出具体计划，并报告我们。

中 央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军委关于注意研究夺取台湾 问题给粟裕等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粟张周<sup>〔1〕</sup>、并告华东局：

(一) 元辰电悉。同意十兵团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二)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军 委

六月十四日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刊印。

### 注 释

〔1〕指张震、周骏鸣。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



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



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



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兹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如下：

## 第一，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甲) 制法：

(一) 旗面为红地，长方形，横直为五比四。旗杆套用白色，宽为旗面横长的十六分之一。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旋纹，上置黄色矛头。

(二) 由旗面的中心点向上下划一垂直中线，向左右划一水平中线，将旗面分为四个面积相等的长方格。

(三) 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位于上方近旗杆之长方格内。

(四) 将该长方格上下划十六等分，左右划二十等分，在上下八比八、左右六比十四处，定一点为圆心，以四等分长度为半径作一圆，用直线将该圆周的十五等分点联成一五角星，星的上角顶点在圆心垂直正上方。

（五）“八一”用汉字，每笔均系等边长条体。旗杆在左时，该二字置于五角星的右下方，并由左向右横写。旗杆在右时，则该二字应位于五角星的左下方，并由右向左横写。

（六）“八”字每笔长三等分，宽一等分，置于一小长方格内。该小长方格的上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七等分，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四等分，左边（如旗杆在右则为右边）为由五角星之右上角尖（或左上角尖）向下所作之垂直线，右边（或左边）距垂直中线向左（或右）四点五等分。“八”字两笔的外侧六个直角尖端应紧接该小长方格的相当各边，内侧两个直角尖端相距约半等分。“一”字长为四等分，宽为一等分，该字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五等分，右边（或左边）即在垂直中线上。

（乙）各级军旗尺寸如下：

（一）人民解放军总部 横一七〇公分 直一三六公分

（二）野战军（一级军区同）及兵团（二级军区同） 横一六五公分 直一三二公分

（三）军（三级军区同） 横一六〇公分 直一二八公分

（四）师（军分区同） 横一五五公分 直一二四公分

（五）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同） 横一五〇公分 直一二〇公分

## 第二，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甲）军徽用作帽花时，其制法及尺寸如下：

（一）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十五公厘（略作二公厘高之凸形）每个角均为三十六度，外镶一点五公厘宽之金黄色边。

（二）“八一”为宋体汉字，适当地直置于红星内。



(乙) 军徽用于臂章、奖状、文书、车、船、飞机及建筑等物时，则按照上述尺寸比例放大或缩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公历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刊印。

#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

根据上项原则，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一九四八年“五一”口号第五项之下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组成之。

- (1) 中国共产党；
-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3) 中国民主同盟；
- (4) 民主建国会；
- (5) 无党派民主人士；
- (6) 中国民主促进会；
- (7) 中国农工民主党；



- (8) 中国人民救国会；
- (9)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 (10)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 (11) 中国致公党；
-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
- (13) 中华全国总工会；
- (14) 解放区农民团体；
- (15) 产业界民主人士；
- (16) 文化界民主人士；
- (17) 民主教授；
- (18)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 (19)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 (20)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 (21)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 (22) 国内少数民族；
- (23)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第二条 前条各单位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筹备代表为四人至七人，其确定名额按各单位情况协商定之。各单位筹备代表之人选，由各本单位提出，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单位协商通过，其前条第五、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各单位之筹备代表，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其他各单位共同推定之。

第三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负责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之一切筹备事宜，其中心任务为：

- (1) 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和代表；
- (2) 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时间、地点及议程；
- (3) 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



（4）制定共同纲领草案；

（5）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第四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常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由各单位协商推举之。

常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五人，由常务委员会选出，主持常务委员会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常务委员会及主任副主任进行工作，其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决定之。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下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其组织及人选由秘书长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之。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

第八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开会须有参加单位半数以上之出席。表决时，各单位不论其人数多少，均为一权。一般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执行，但对有关基本方针之决议，如第三条第三、第四和第五各款，经多数通过仍有不同意者，有保留至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重新提出、或不签名、或退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自由。

第九条 本条例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实施。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与各国通邮通航 问题给上海市委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

上海市委并华东局：

(一) 市委虞电悉。同意你们主张先从上海与华盛顿交换邮件包裹。但请你们研究通邮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电告。

(二) 海口被封，海航暂停，请你们考虑照海航规律，我们暂以上海为国际空航起落点，向各国作不损害主权的开放，但不能在中国境内转航（即不能由上海再飞天津或其他城市），并且只做临时协定，不订长期合同。如此做法，有无流弊，外国航空公司是否愿来接洽，均望以你们考虑结果电告。

中 央

已篠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 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 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定为下列四十五个单位，代表总额五百一十名。

(甲) 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

1. 中国共产党十六人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十六人
3. 中国民主同盟十六人
4. 民主建国会十二人
5. 无党派民主人士十人
6. 中国民主促进会八人
7. 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人
8. 中国人民救国会十人
9.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十人
10.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八人
11. 中国致公党六人
12. 九三学社五人
13.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五人
14.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十人

(乙) 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

1. 西北解放区十五人
2. 华北解放区十五人
3. 华东解放区十五人
4. 东北解放区十五人
5. 华中解放区十五人
6. 华南解放区八人
7. 内蒙古自治区六人
8. 北平天津两直属市六人
9. 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七人

(丙) 军队代表六十人：

1. 人民解放军总部（包含直属兵团及海、空军）十二人
2.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人
3.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人
4.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人
5.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人
6. 华南人民解放军八人

(丁) 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人
2. 各解放区农民团体十六人
3.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十五人
4.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十二人
5.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九人
6. 全国工商界十五人
7. 上海各人民团体九人
8.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十五人
9. 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推举十五人
10. 全国教育界十五人



11. 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十五人
12.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推举十二人
13. 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十人
14. 国内少数民族十人
15.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十五人
16. 宗教界民主人士七人

二、前条所列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十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二人，不满十人者，得推候补代表一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三、除第一条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

四、各单位代表名单除因特殊情形经常务委员会同意者外须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五、本规定之实施办法，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 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李 维 汉

第一小组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就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与各单位代表名额起草一个规定的办法，提到大会上



通过。

从去年冬季的时候，中共中央曾与到达东北的各位先生商议过一个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意见。在那个意见上，曾经是这样的设想，将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是三十九个，并且对每一个单位代表名额做了一个原则的拟定，即四至六名。这一个拟定，因为是在当时情况下提出的。提出以后，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广大的国土及许多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半年期间，许多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如去年的总工会，今年的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都召开了正式的会议；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这个月也要召开（代表都到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已经成立了；科学工作者会议筹备会现在也已宣布成立了；社会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正在这里酝酿发起；工商界联合会筹备会也可能在最近成立。这就是说，因为广大地区的解放，使许多全国性的团体有了成立的条件，所以就先后成立了，或者发起了，或者成立了筹备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名额应该重新考虑，就是应该比以前所拟定的单位要增多，名额也要增多，这样才能适应这个情况。

第一小组成立后，先后由各单位磋商，然后又拟出了一个草案，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全体组员一致通过了现在发下的这个草案。并且把这个草案送给各单位首席代表看过，又送给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各委员看过，得到了一致的协商。

草案第一项是规定单位同名额。总的单位是四十五个，代表总名额是五百一十人，里面包括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



第一项，关于单位的规定，要说明几件事：

党派单位方面增加了三个：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周恩来同志在他报告筹备会组织条例的时候，已经说明了。

军队代表原是五个单位，现在增加了华南解放区（湖南、广西、广东的一部分，福建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地区的解放军在这几年做到了坚持游击战争，现在发展的很大，并建立了几个纵队，所以应该有代表。小组又提议增加北平、天津两个直属市的代表，因为将来北平、天津是首脑所在，应该有这两个地区的代表参加。原来拟议上，有文化界民主人士一个单位，现在因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就要召开，另外科学会筹备会已经成立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也要成立，所以将它化成三个单位。从前拟议中有妇女界民主人士这个单位，现在因为全国的妇女民主人士大多数都参加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所以小组认为妇女界民主人士这个单位不必要单独列入。由于以上之增减，所以就由三十九个单位变成了四十五个单位。

在小组工作的前后，曾经有代表提出了以下几个单位的问题：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单位列入，在原来拟议上是保留到筹备会。今年春季，中共中央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次研究与协商，认为民社党革新派在这几年的变化是经过一些曲折。经过这些曲折，经过几次分裂，现在的确在民社党革新派内部存在着民主分子，在这一个时期他们也是努力奋斗的。但是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到将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考虑个别邀请。还有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冯焕章先生在美国的时候领导的），这是一个海外团体，中国华侨在海外的民主团体很多（像南洋就很多），所以我们



小组大家一致向代表们提出这样的意见，即也作为个别邀请参加将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必作为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这个团体据我们所知道的，里边的确是有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成分，特别是最近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对于这个团体，我们的意见也是不必作为一个单位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交筹备会常委会将来考虑，如有必要的话就个别邀请。

又提到工程师学会，因为现在的全国科学会中包括理、工、医、农四个主要科学部门，工程师学会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它的代表将来可以在全国科学会中产生，因此也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将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对于以上几个单位的问题，我们第一小组的意见，提出这样的处理。

此外，第一小组提议，除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个特邀请单位，为的吸收不能参与上述各单位的民主人士参加。这是关于单位与代表人数问题，我们考虑讨论的经过。

第二项，小组会提议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每个单位，可以规定提出候补代表，办法是：“其代表名额满十人或十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二人，其代表名额不足十人者，得推候补代表一人”。候补代表可以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对于代表名额分配，是根据这样原则考虑的：考虑到将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规模，考虑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各单位的代表性。我们觉得应该在分配代表的时候强调“各单位的代表性”，而不强调“各单位的代表人数”。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原则，分配代表名额。

另外，我们也考虑到上述单位的相互关系，将来在全部代表中，可以由常务委员会考虑，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中间相互关系很多的，例如各党派方面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实际



在这里面还另外包含两个党。单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来讲是十六位代表，但是如果包含其他两个单位来讲，就是三十九位。民盟也是如此。民建与产业界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其性质相同，所以将来在分配代表名额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他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有团体与区域中也有交错关系，各人民团体与各解放区之间也有连带关系。所以在小组开会时，妇女联合会蔡畅同志提出一个希望，希望在全部代表中妇女代表能占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五。我们小组认为，她这个希望，如果从全部各单位的相互关系来看，各单位都考虑这一点的话，就可能实现。如果只是妇联，就很难做到。这种关系，在将来各单位推选代表时（候补代表都可考虑到），如果照顾整个的话，可以有某些调整。

第三项，是关于特别邀请单位将来怎样规定。我们小组会上曾考虑到是不是要在草案上明文规定特别邀请单位人数不要超过四十五个单位的代表总名额百分之五，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这样规定：“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及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现在大会不作具体规定为好，因为要考虑到将来要发生新的情况，今天没有设想邀请的，将来可能需要邀请，或者这时候设想将来要邀请的，将来也不一定邀请，所以现在若作一个具体规定，就不如授权常委会处理这些问题。

第四项，原来在我们小组上没有提出。在昨天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与各小组长的联席会上，认为应该加上这一项：各单位代表名单须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因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不会推得太迟，八九月就要开会。如果代表产生太迟，就不能参加会议了。所以提议各单位须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把确定的代表名单向



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来。

第五项，这个规定虽然已经把主要的问题确定了，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是可能有许多细节，可能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所以应该作这样一个规定：“本规定的实施办法，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按照准备、人数等各种具体情况去考虑规定一些实施的办法，而在我们这个全体会议上不可能作更详细的规定。

第一小组向大会提出五项规定，请求大家讨论并通过。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sup>\*</sup>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 恩 来

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大家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因此，有很多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单枪匹马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形成一个组织，就要经过许多手续和挫折，那是很困难的。当然也有形成组织的，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这三个大的组织联系了许多组织，还有秘密组织。但是，也还有许多人一直是孤军奋斗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代表中就有：一直领导着一支文化大军的郭沫若先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受着严重压迫的马寅初先生、李达先生，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先生，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先生，等等。他们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奋斗的结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和允许在各党派以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参加旧政协。当然，由于当时跟国民党协商时不得不带有若干妥协性，所以在参加旧政协的人中

---

<sup>\*</sup> 这是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也有不是为民主而奋斗的、由国民党方面邀请的几位“社会贤达”。这些人后来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参加了伪国民政府。因此，大家一听到“社会贤达”这个名称就有不快之感，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就很痛恨这个名称。他在香港同各民主党派首先响应中共去年“五一”号召的时候，就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他是以参加民主运动的这样一个身份来领头响应的，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位这样的人参加了民主运动。在他们诸位到哈尔滨以后，中共跟他们电报磋商的时候，也觉得有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项为好。因为要承认这些不属于各民主党派的先生们过去的确经过了长期奋斗，所以要请他们参加会议。当然，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一定要经过各方面的协商。

现在有一个分类问题，即把无党派民主人士摆在哪一类代表里为好的问题。就是说甲项里头是民主党派类的代表，把无党派也摆在党派里头，好像在文字逻辑上不大通，这就请大家来讨论。

回答文字逻辑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想到问题的本质。因为这一部分人士，也是长期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管是哪一个社会，总是大部分人反对一小部分反动派。这种反对反动派的一大群人的活动也就是政治活动。所以从广义上说，这就是一种党派性的活动，只不过有些民主人士没有党派的组织罢了。正确地写出来应该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当然，在座的诸位假使还要把它摆到其他类别里，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把政协委员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指党派性的；第二类是指区域性的，包括已解放了的地区和待解放的地区；第三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类是人民团体。从广义来说，第四类也还不仅是团体，比如海外华侨，



不一定是由团体选出的，而是由我们公推的。另外华侨还有地域的性质。不过如果把它摆在地域里面，好像我们的国家要发展到海外了，那就不好。所以还是把华侨摆在团体这一类为好。再如少数民族，凡是在已经解放的地区，现在已形成了政权组织或是自治区的，就摆在区域代表里面了。但是在没有被解放地区的少数民族团体和人士，就摆在团体或民主人士里面。这些分法是大体的分法，广义的分法。严格地说，每一类里面都可以再把它细分成多少小类，但这样做起来就比较不容易。目前这种分法是概括性的，是本着原来同各方面协议的精神来分的，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合适，请大家讨论。

关于特别邀请的代表就不同一些。这是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确定的。被邀请的人物当然总是在这一个时期有所表现的，如在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推进当中，对推翻反动政权、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等方面立过功的；或是目前我们认为需要特别邀请他来参加的一些人物。如：在上海主张和平、反对国民党内战，以后到石家庄谈判的颜惠庆先生、章士钊先生、江庸先生；对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的傅作义将军、邓宝珊将军；这一次南京反动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到北平后极力赞成和平协商，最后赞成共同商定的和平条款即八条二十四款的张治中先生、邵力子先生，等等。这些人物都是考虑在邀请之列的。虽然这些先生并不属于过去的民主运动的人物，但是在这个时期中立了功，或有所表现，是值得我们邀请的。当然也不仅限于这几位。我们要从长计议，由常委会考虑协商，然后拿到全体会议上通过。所以，特邀的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面上好像可以作为一类，其实并不是一类。这些被邀请的人士，不一定是无党派的，如张治中先生、邵力子先生，你说他无党派行



吗？不能那么说。他们是另一种情况。将来邀请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情况，把他们摆在无党派是不合适的。整个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阵容是五百人左右，一部分特别邀请的人士增加到这个基本阵容里来，更可以增强团结性。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 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sup>〔1〕</sup>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sup>〔2〕</sup>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 恩 来

一九四九、六、二十一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邓颖超。



## 中共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的处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三十日)

—

南京市委并华东局：

市委已巧电<sup>〔1〕</sup>悉。

(一) 司徒返美既在三四周后，可能仍将提出来平一行。陆志韦亦曾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

(二) 傅泾波提出有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持联络，应坚决回答没有，以堵塞其任何试探。傅泾波去美护照，即由南京市政府发给，样式托龚普生带上。

(三) 美机在离南京前可允其试飞一次，范围由军管会规定，其返美路线，亦宜规定之，并于事前通知我沿途部队以免误会。

中 央

巴 马

---

\* 这两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 二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已俭电<sup>[2]</sup>悉。

（一）陆志韦给司徒信稿，曾由我同志交来一份，内容第一句只说见过周<sup>[3]</sup>，未提周告陆任何事。实际上六月十四五两日及其以前数日周均未遇见陆，更从未与陆谈司徒问题，如傅所携陆信为亲笔签字信，则陆为两面做法，故以假信给我。如傅所携陆信为抄件，则可能为傅故加数语，以抬高司徒身价。望告黄华再回忆陆信内容究如何，此间当将陆信译件另电告，以便对照后证明阴谋挑拨者究为陆抑为司徒及傅。

（二）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三）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保护，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会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中 央

已陷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 注 释

〔1〕指中共南京市委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给中央并华东局的电报。电报报告了六月十八日傅泾波到外侨事务处与黄华谈话的内容：傅泾波称，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电报请示：一、傅泾波在谈话中没有再提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今后是否予以暗示，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二、傅泾波去美国护照是否由南京市政府发给。三、可否允许美国飞机离南京前试飞一次。

〔2〕指中共南京市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给中央并华东局的电报。电报说：六月二十七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访黄华，信的大意为：周恩来曾告陆志韦，毛泽东已宣布司徒雷登希望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之意。中共希望司徒雷登将燕京之行与交谈贸易及国际问题分开。黄华当即指出：为何中共方面得知司徒雷登欲北访燕京，系因月初其曾有过表示，但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其北上，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仍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泾波同意电告中共中央，但企图要中共方面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六月二十八日，黄华访司徒雷登及傅泾波时，告知中共中央“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说：因国会于七月底即将休会，时间上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虑决定。

〔3〕指周恩来。

#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 《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 《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两文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线委员会，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中的军师团委，地方上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

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执行情形望告。

中 央  
六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附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短评）

毛主席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典礼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他们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均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阴谋，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暴露了出来。这是因为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公开的武装的斗争已经失败，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让位于隐蔽的斗争。在城市中，国民党匪帮在溃逃或被歼以前，便在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和帮助下，预先有计划地布置好了潜伏的特务活动。解放以后，特务匪徒们便施放谣言，侦刺情报，组织



抢劫暗杀，扰乱社会治安；印制假钞，捣乱金融，歪曲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挑拨劳资纠纷，阻碍生产的迅速恢复；他们用纵火、爆炸和其他暗害方法，破坏国家的工厂、矿山、仓库及其各种设备和物资。沈阳的美国间谍案，北平国民党特务匪徒的纵火和暗杀暴行，以及中外破坏分子在上海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捣乱工作，显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匪帮，正在大规模地利用特务活动，对于人民民主统治进行反抗和破坏。在农村，尤其是解放不久的河南、安徽、湖北和江南广大农村，国民党匪帮正大批派遣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的恶霸分子，利用封建会门，组织土匪，烧杀淫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村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捣乱人民解放军后方。事实告诉我们：不彻底肃清这些特务匪徒，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毛主席所提出的另一重要任务，即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将不能顺利地实现。

当然，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匪帮要想以特务匪徒的捣乱破坏，来推翻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建立，那只是做梦。但如果我们轻视这些敌人，以为革命胜利，万事大吉，只要多喊几个“万岁”，就可安心睡觉，那就是极大的错误了。敌人虽然已经失败，但是还没有完全消灭。“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而且敌人越是接近死亡，便越是疯狂和残暴。如果我们不牢牢记住毛主席的告诫，放松警惕，那么我们会吃大亏，就会使人民民主祖国遭受许多可以避免的损失。过去若干地方特务匪徒之所以能够达到破坏的目的，正无一不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在政治上或多或少的麻痹所致。现在和将来，特别是目前新中国刚刚在建立的时机，敌人是一定会利用我们的困难，对人民的国家进行反抗和破坏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否经常地保持戒



备状态，组织力量，和敌人的这种捣乱活动进行斗争。

无数的事实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教训，要求我们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和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各民主阶层的人民，高度警觉起来，共同展开除奸防特的斗争，扑灭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特务匪徒的阴谋活动，保卫人民的祖国。我们要采取坚决的而又谨慎的步骤，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来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捣乱。因此，一方面要克服骄傲自大，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捕风捉影，打草惊蛇。对于查获的特务匪徒，应按情节轻重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对那些被胁迫参加，真心悔过的分子，可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对那些作恶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发扬人民民主政权的威权，严加惩办，为民除害！

## 附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短评）

最近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失火和被毁事件。以北平一地为例，不久以前电车厂曾被特务纵火焚毁电车五十余辆，五月二十五日又发生石景山钢铁厂化验室失火案，使国家财富遭受浩大损失。对于这样严重危害人民祖国的事件，决不应让它继续发生，而必须迅速地采取必要的步骤，予以根绝！

谁都知道，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的统治，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在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的时候，放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最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就是恢复



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勤劳努力，加上其他有利因素，这一近百年来许多优秀人士所怀抱的理想，是有把握在相当时期内实现的。但要建设工业，就必需有大量的资金。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从掠夺和剥削殖民地和其他原始积蓄的野蛮方法来取得它，只有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薄弱的产业基础，用双手辛勤地劳作，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因此，现有的国家财产，就是一柄铁锤，一个螺丝钉，对于我们都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我们不能严肃地负责保护自己人民祖国的财产，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将会受到绝大的困难。所以，对于所有一切国家财产，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地来爱护它。

检查各地工矿企业的被毁事件，主要地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匪帮和特务匪徒的破坏。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是从来不要祖国的，现在由于他们的统治已经灭亡，国家成为人民的了，便更加穷凶极恶地进行破坏和抢劫。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正在兢兢业业地从事恢复和发展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国家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便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企图毁灭国家经济，使人民生活陷于绝境，从而动摇人民民主政权的统治。国民党匪帮在溃逃的时候，大肆洗劫和破坏许多城市和乡村；而在这些城市和乡村被解放后，又以预置的特务匪徒继续执行暗害勾当。北平电车厂电车的被纵火焚毁，便是特务匪徒们所做的千百种这种罪恶的暗害勾当之一。二是我们某些经济管理人員的对于国家财产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中间目前存在着一种极端有害的思想，就是仅仅知道贪污可耻，而对于自己玩忽职守、失于检点所招致的国家和人



民财产的巨大损失，则错误地认为偶然不慎，满不在乎。正因如此，所以在某些国家企业内部，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作风，管理组织和制度松弛，纪律弛废，防火安全设备不周，平时疏于防范检查，一旦发生事故，大则满足于检讨，小则根本不向上级报告。如果不向这种官僚主义恶习气作坚决的进攻，要想保护国家财产完全免于破坏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为了制止破坏，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经济，便必须：（一）在工人、职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中，经常地进行关于重视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使大家认识保护国家财产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在工厂企业内部开展反对浪费和破坏国家财产的思想斗争，坚决地打击那种对于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的错误态度。号召提高警惕，防止特务匪徒的破坏，组织工人纠察队，保卫工厂、矿山、森林、仓库。制订和实施奖惩办法，严明赏罚，保护国家财产者奖，损害国家财产者罚。（二）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经常地检查和改进工矿企业的管理、组织、制度、纪律、消防安全设备。如因怠于职守或管理不善，以致发生失火或其他灾害，其肇事者和主管人员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像这次华北人民政府和北平军管会在处理石景山钢铁厂化验室失火案中那样，严格追究责任，扣押追讯当事人，按情节轻重分别处治，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便不能严肃国家纪律，并教育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和广大职工，保障国家财产不受损害。（三）对于那些破坏国家工矿企业和人民财产的特务匪徒，务必缉获归案，对于首恶分子查有实据，便应施行严厉的镇压，使这辈宵小丑类不敢继续为非作恶。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 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部署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德怀同志：

二十六日电悉。（一）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南坊、通润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sup>[1]</sup>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罗<sup>[2]</sup>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sup>[3]</sup>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



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给贺龙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

已感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 附：彭德怀关于全歼胡、马军的 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

(一) 十九兵团七月四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午齐开始向敌进攻。就现在敌人部署，青、宁两军集结于乾、永、邠、常宁镇、南坊镇、通润镇地区。胡、王部目前无变化。拟以十八兵团钳制王匪军，十九兵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匪主力，被歼后则以一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三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于十九兵团位置乾、礼、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二) 二十五日开军师以上干部会，七月四日以军或兵团为单位开“七一”、“七七”纪念会，尽量动员居民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全歼胡、马匪军，克服困难，解放大西北。妥否，盼示。

彭 德 怀

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注 释

〔1〕指马步芳、马鸿逵。

〔2〕指林彪、罗荣桓。

〔3〕指刘伯承、邓小平。



#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



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



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



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



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基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



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



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



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



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



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



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sup>\*</sup>

(一九四九年六月)

刘 少 奇

一、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完结，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

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三、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大部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得多。但在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特权以后，我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地恢复和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应该怎样和采取什么路线去发展经济呢？

四、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

- (1) 国营经济；
- (2) 合作社经济；
- (3)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

\* 这是刘少奇写的党内报告的提纲。



(5) 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五、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合作社经济今天还很少，但可以很快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少，但可能在一个颇大程度上去组织。国家经济则在接收全国官僚资本后，以及在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不过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

六、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

七、在前项基本矛盾的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而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



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八、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如下：

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九、我们从国民党政府及战犯手中可接收不少的大企业，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也将逐步收回或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剩下的私人资本的大企业，已经不多。铁路、银行、对外贸易、邮政、电报、大钢铁业、盐业、纸烟业和大部分矿山、轮船、纺织业等，将由国家经营或由国家监督经营。目前的问题是：（1）我们还没有制订完备的经济方针，还没有完备的经济计划；（2）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3）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的经济机关，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国营经济常出现无



组织无政府状态，互相竞争，商人资本家则从中渔利。中央拟于最近发布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决议，建立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各省各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财政、工业、铁路、船运、邮电、农业、商业各部及国家总银行与各专业银行，并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建立国营、省营、县营、市营各企业间的正确关系。

十、我们在土地改革已完成的地区组织了许多劳动互助组。还拟普遍地组织消费合作社、农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劳动互助组。要办学校训练干部，并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领导机关及合作银行。

十一、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现在已有少数加工、定货企业。

十二、依国家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发展的程度，适当地实行某些物品的配给制，以保证军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及学校学生的生活。对市场则采用调剂物价的政策，以与奸商作斗争。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以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

十三、很明显，苏联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援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1）经验上的援助；



(2) 技术上的援助；(3) 资金上的援助。此外在物资方面似应实行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如果这种援助和互助是很大的，那就可能帮助中国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

十四、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 军委关于应极力争取程潜 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给林彪、 邓子恢等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林邓，并王萧<sup>〔1〕</sup>：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sup>〔2〕</sup>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sup>〔3〕</sup>、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军 委  
午 支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 释

〔1〕指王首道、萧劲光。

〔2〕指程潜一九四九年六月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湖南省工委派人将备忘录送到武汉，由王首道、萧劲光转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3〕指蒋介石。



#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 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敬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 一、中国的目前形势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的地区已有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二亿七千五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一千零四十三一个，占全国二千个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百五十九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在内，现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只有二十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三百九十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二百四十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



与机关学校，空军有七千五百人，海军七千七百人。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在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方能去占领。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去占领新疆的最大的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自可大为提早。

除开军事上的胜利而外，我们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了。但由于中国的交通条件与自然条件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须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充分地加以估计了的，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现在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戒。但照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这种可能，而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扑灭与阻止中国革命，并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



对此已作了一些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是能给我们一些困难和损失的，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动全中国的人民及其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种干涉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应付得当的话，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是有可能不敢来尝试的。我们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实行武装干涉的口实，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增加困难。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在开始实行。这能够给我们一些困难，特别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将发生困难。但这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则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 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



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二十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零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须要解释的。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



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今年二月安得列夫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方面也有指示要我们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一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种伟大的进步，这是在不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在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十来个民主党派，它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其党员总共不到三万人，其中民主同盟有二万人，是比较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影响的。它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党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来，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在最近才断绝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只是勉强地和共产党一致。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



提出的一般纲领，它们都公开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除开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而外，还没有最后地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欧洲国家所有的那种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比较有重要作用的，是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这些团体，有的已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发展会员中。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已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当能发生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开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并召开了妇女的、学生的、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及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迅速瓦解，其领导分子早已逃跑或消极了，其中较好的分子，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靠近我们。被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则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它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安得列夫同志今年二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员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一切城市中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在过去有很久的间断，今天还需要重新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不能进行



得很快。我们希望能有几个苏联有经验的同志去中国帮助这些工作。

### 三、关于外交问题

最近联共方面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受到失败以后，现在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下的方法来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与破坏中国革命；
-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 （四）用许多方法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接近，企图拉拢中共去与帝国主义国家靠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并且是有过经验的，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革命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方针已载入我们二中全会的决定。这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军队所到达的地方，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业已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它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何种步骤和方法来加以处理？是值得考



虑的。

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几项原则来进行：

（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的情况，没有调查，据日本在一九三六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六国在华投资总额为十八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其中英国占十亿多，美国占二亿二千万，德国与意大利占二亿一千多万。铁路借款与政治借款占五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四亿五千多万，经营出入口的贸易投资三亿八千多万，经营工矿业的投资只有三亿六千多万。但在经过抗日战争以后，日本及德、意在华投资均被没收，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经济事业是：银行保险事业、进出口贸易事业、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有英国占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四百万吨）及上海与天津的英国烟厂和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工业，较占重要地位，其他事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在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事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但若干帝国主义者已将活动资金向外逃避，或采消极的观望的态度。在将来的何种时机并采何种方法去处理帝国主义在



华的各项投资呢？没收呢？还是采取其他的方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决定。在目前，我们正忙于作战及其他工作，暂时还来不及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作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宣传文化事业，除开他们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与通讯社而外，据旧的调查材料所载，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有三十一所，神学院有三十二所，图书馆二十九所，文化团体二十六个，中学校三百二十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教会三千七百二十九所，宗教团体九十三个，医院一百四十七个，慈善机关五十三个。对外国原来的报纸杂志与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到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在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条件下继续办理，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堂的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之下予以没收分配。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待遇他们。这样执行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则到处向我们请求和钻营，企图取得我们事实上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作也没有作过的事。但这样作，各国侨民感觉不



方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地区的侨民约有十二万人，其中上海有六万五千多人，东北有五万四千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为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我们，或提出若干足以束缚我们手手的条件来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足以束缚我们手手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呢？还是等一等，不急于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免得麻烦呢？在中国新政府成立以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快些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不理我们的政策。

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后，予以承认。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关于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作了些解释，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面



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面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就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宣言。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中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为增进与巩固两大民族的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

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

（一）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



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作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

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空诸问题，我们希望能迅速地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

关于与东欧各新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

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与帮助，除开苏联派专家去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去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来苏联参观与学习，派一些学生来苏联学习。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



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希望拜会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来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来拜会。他来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加以指示。

关于苏联贷予中国的三亿美元的借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项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以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 刘少奇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 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市委，省委，区党委：

现在各地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争议的办法，非常混乱。没有设立专管机关，没有规定一定的手续。甚至城市中的每个区委，街区政府，每个工作组，每个下层工会组织，都可以自由解决劳资纠纷。或者完全放任自流，让每个工厂、作坊、商店的职工，与每个企业主直接解决。以至互相影响，此落彼起，纠纷日益增多。这种处理劳资纠纷中的无政府状态，是造成解决这个在目前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发生各种偏向，特别是“左”倾冒险主义偏向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果，不仅使资本家害怕，消极，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发生不满，形成目前恢复发展生产中的重大障碍。因此，各地党委，特别是各大城市市委，必须迅速采取办法，纠正这一危险的现象。中央有下列提议：

(一) 一切有关劳资纠纷问题，均须集中到市一级机关，即市劳动局、市总工会、市工商局来统一解决。禁止区委、区街政府、下级工会组织，处理任何劳资纠纷。宣布解决劳资纠纷的口头的与书面的契约，必须经市劳动局批准备案后，方为有效。为此，必须将各区的得力干部，集中到市总工会与市劳



动局，来进行工作。必须由市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来担任总工会主席与劳动局长。

(二) 有许多城市，至今尚未建立劳动局。一切劳资纠纷，都由工会来调解处理。这是严重的错误。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能代表工人说话，决不能站在劳资之间或劳资之上来调解仲裁劳资纠纷。否则，必然使工会脱离群众，模糊群众对工会的认识。现在有些地方（如济南）的工人说：“哪里有工会，那里的工人就倒霉”。这就是由于工会不是站在工人组织地位代表工人说话，而是站在政府地位去处理劳资纠纷，并强制工人减低他们的要求所造成的结果。如果工人提出过高要求时，工会是应当说服工人减低这些要求的。但是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说明这些过高要求对于工人群众实际上有害无利。在与工人群众商妥了这些要求之后，即应当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和协商。无法达成协议时，即提请劳动局以调解仲裁的办法来解决。工会代表，无论在协商时，或调解仲裁会议上，均应代表工人说话，而不应当站在中间立场或政府立场说话。因此，各大城市，必须迅速设立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劳动局，作为调解仲裁劳资争议的唯一机关。并正式规定解决劳资争议的手续为：

甲、劳资双方直接协商（即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本家或资本家组织的同业公会协商）；

乙、市劳动局调解仲裁；

丙、仲裁不服时得向法庭起诉。法庭判决，为最后程序，双方必须服从。

(三) 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应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可以由每个工厂企业的工会组织，直接与本企业的资本家谈判订立（如在同一城市中，有几个同一性质的



工厂、企业，而资本家又有联合组织者，最好还是由产业工会与资本家的组织订立，而不个别订立，以免高低不齐互相影响）。在旧式的小企业、商店、作坊中，必须由同一行业工人店员组成的工会与本行业资本家组成的同业公会订立。因为在同一城市中，同一行业，都有大致相同的习惯或行规，因而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就有基本相同的共同点。这种办法，可以做到使同一行业包括的许多企业、作坊或店铺所发生的问题，在一个集体合同当中得到基本解决。这样，才能使零碎分散的作坊、店铺中的劳资纠纷，做到有条理、有组织的解决，而且比较容易做到合理恰当，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差。如果不这样办，而让每个小企业、作坊、店铺的劳资纠纷都单独解决，必然造成混乱现象，难于掌握，以至互相影响，此落彼起，愈解决纠纷愈多，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偏向。

以上几点，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斟酌试办。并将试办之经验，随时报告我们。

中 共 中 央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五 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周 恩 来

各位代表：

让我首先向你们庆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成功，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新文艺大军在跟敌人作战上，曾经取得很多的胜利。我们打败过封建文艺，二十年来我们又打败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艺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在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方向下，我们建立了广泛的文艺战线。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决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



对于文艺界大团结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在各方面坚持岗位艰苦奋斗的朋友们，不能不归功于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支持，但是尤其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没有军事战线上的胜利，那么我们今天这样七百多人的大团结大会合，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讲话的第一部分，我想向大家说说我们这三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情况和根源，以及文艺工作所应当由此得到的教训。

## 一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一九四六年的七月算起，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战绩，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三年以前，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四百三十万军队来进攻。那时候我们只有一百二十万的人民解放军，与敌人相差三百一十万之多。反动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主人在当时满以为一定可以打垮人民解放军。多少好心肠的朋友也曾经为我们担心。我们感谢这些朋友，但是我们坚定地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的时候，许多的新闻记者问我：“你们还回来不回来？”我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果然回南京了，不过进入南京的不是我们当时的代表团，而是胜利的人民解放军！

战争的第一个年头，敌人是处于进攻阶段，但是因为受到了我们的重大打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很快就变成了局部的进攻或重点的进攻。第二个年头，我们开始反攻，华北和华东的野战大军渡过黄河向南前进到长江北岸，同时东北的人民解放军也由北满向南满进攻。在战争的第三年，我们的进攻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经过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初的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底的平津战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就从此基本上被消灭了。因此，在今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不可能组织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防线。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现在的三年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开始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九万人，这一百四十九万人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机关、学校和后勤部门，战斗的部队大约只占半数。我们人民解放军却从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今天的四百万人以上。巧得很，他们少了二百八十万，我们多了二百八十万。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的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着已经只剩八十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我们已经解放了两万万七千九百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一千零六十一座城市，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两万一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八十。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以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这个情况，使我们相信人民解放战争的第四年，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

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的伤亡一共是一百四十三万人，而消灭的敌人是五百六十九万人，就是说我们伤亡一个人，消灭他们四个人。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三年中间，消灭了敌人正规编制的军队四百九十五个师，连非正规部队算在一起，消灭了敌人二千一百五十个团。俘虏的将级军官，加上上校级的师长，达到九百二十七人。三年中间缴获的武器，有各种炮四万四千多门，轻



重机枪二十五万多挺，长短枪二百多万支，飞机一百三十四架，军舰一百二十三只，坦克车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马十三万匹，步机枪子弹三万万七千多万发，炮弹三百一十一万发。我们就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

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人民解放军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

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



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提议我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以及所有解放军代表同志，你们应当利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热烈招待没有看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家到部队里去参观，给他们调查和写作的便利。

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不是孤立的。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得了土地，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两万万的农民将要进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这在农业的中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们把生产节约的粮食供给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只要哪个地方的战事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就掀起了生产热潮。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伟大的中国农民，特别要感谢老解放区的农民。尽管农民有他们的落后的方面，要待我们耐心地改造，然而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值得我们记录和宣扬的。所以我们希望已经习惯于乡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乡村工作，为他们服务；同时也欢迎没有到过农村的、没有习惯于农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去学习农民，与农民做朋友，以便于写下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不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尽管我们二十二年斗争的很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在农民和部队里面，但是我们的斗争是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着进行的。从政



治上说，是在工人阶级通过他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在乡村中间，我们也不能离开工人。大规模的战争首先不能离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是敌人输送给我们的，但弹药还需要我们自己的补充。我们依靠工人。我们把大的锅炉从矿山从机器厂用几千人抬到太行山上，抬到五台山上，抬到沂蒙山区，在山上建设了工厂，几千万的手榴弹，几百万的迫击炮弹，几十万的山野炮弹，便这样生产出来了。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兵工，我们在乡村中还发展了各种小规模轻工业，供给军需民用。今天我们进入大城市以后，情况更不同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

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一般精神劳动的特点之一是个人的劳动（当然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许多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在这一个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胜利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却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长大，曾经经历过错误和失败，但是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是站在正确的方面。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敌人，几千



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年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集中表现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的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同时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同志常常说，我们每一级的党委应该交几个文艺界的朋友，以便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目标上共同努力。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人民力量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影响和援助。不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的援助，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也给了中国人民以伟大援助。帝国主义阵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西方，把次要的力量放在东方，这对于中国革命就是一个首先重要的有利条件。苏联的存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新战争运动的存在，这一切力量的总和大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力量的总和，因而阻止了新世界战争的爆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武装干涉中国。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全国人民传播这个真理。我们要分清敌我，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打击战争贩子的叫嚣，揭穿他们的恐吓、挑拨和欺骗。这个庄严的工作，是中国民族利益所要求的，也是世界人民利益所要求的，这正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 二 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想讲几个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

第一，团结问题。我们现在开的是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应该说，出席这个大会的七百五十三位代表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现在在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加上直属兵团，加上五大军区，参加文艺工作的，包括宣传队、歌咏队在内，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的数目。解放区的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数目，估计也有两万以上。两项合计有六万人左右。这就是解放区的四百多代表所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新文艺工作者的数目比较难算，大概总有一万人以上。这就是说，你们七百五十三位代表，代表着七万上下的新文艺部队，平均每一个人代表着一百个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旧艺人。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能领导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发扬这次大会的团结精神，并且希望大家经常地密切地联系这支广大的文艺军队，使你们真正不愧为他们的代表。

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一下我们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部队文艺工作者熟悉部队，部分地熟悉农村，但对工人和城市的情形就不熟悉。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熟悉农民，不完全熟悉部队，对城市情况也不熟悉。我们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总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



我们首先需要熟悉工人。现在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一般地都不熟悉工人，所以反映工人的作品还很少。我们希望能有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自己不能到工厂去的，也应该宣传这个号召，把它变成一个运动，推动成千成万的文艺工作者向这方向走去。

这几年有一部分同志已经开始熟悉了农民和兵士，兵士基本上是拿枪的农民。应该继续熟悉他们，并帮助不熟悉的人去熟悉。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希望已经下过农村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自满。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近二十几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

第三，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现在还是不是普及第一呢？还是普及第一。解放区做了一些普及工作，但是离开普及的需要还很远。至于说现在产生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还很粗糙，需要改进，需要提高，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如因此而轻视普及工作，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新生的东



西哪有不粗糙不幼稚的？我们对于新生的东西不要责备过甚，对它要爱护帮助，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新生的事物常常大喊大叫，它要改造这个旧世界，这是一种革命气概。脱离人民的旧文艺已经是腐朽了，尽管外表如何好看，内部已经烂了，希望是属于新的方面。我们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虽然还不高，但它们确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新文艺在普及方面的生长和成就，即使是一些小的生长，小的成就。

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使我们高兴的，就是旧文艺界许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参加这个改造的工作，而且希望同新文艺界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应当用很大的热情来欢迎他们。旧社会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我们过去做了一些改造工作，但是成绩还很小。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实在说，现在这个工作刚才开始。有些人觉得旧文艺没有什么前途，以为它总是要消灭的，因此就发生不重视它，让它自生



自灭的心理。但是，今天的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它，听它，喜欢它，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实视为等闲吗？旧文艺会不会消灭呢？我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它是会消灭的，它又是有前途的。旧文艺里的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有前途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了。我们要这样看，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如果认为旧文艺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样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了；另外我们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样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时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改造旧文艺也跟创造新的普及文艺一样，开始也会是粗糙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粗糙就轻视它，因为你一轻视它，它就很难生长，很难壮大。这种改造工作无疑地将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希望一下子改造得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而不去紧张地努力。

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我们文艺界的朋友来自各方，譬如解放区的，就有一部分是从部队来的，他们是长期地在部队工作，另一部分是从解放区各地方组织来的，他们过去限于环境，工作也带局部性，现在聚会一堂，来商讨今后全国的文艺工作，那就不能不要求我们大家有全局观念。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那一个工作部门，或者只看见我们个人的工作环境，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解放事业，看到我们今天全国的文艺工作，我们的工作才能安排妥当。今天全国接近于完全解放，我们的后方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我们文艺工作



者要了解，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初期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尽可能要求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每一项工作都能很快发展，同时又要求有计划地适合全局的需要与可能，各部门中的分工安排就需要我们根据轻重缓急来定了。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开得确实不坏。但是如果以为它一切都美满，或者以为今后的工作一切都会美满，那么一接触实际，便会有很多地方、很多工作感到不满和失望。假若我们各部门的文艺工作者都有全局的想法，能够和今天的建设联系起来，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就会更快。比如我们的部队还要继续前进到南方、西北、西南，广大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就要向新区前进，去推广文艺的普及工作，和部队配合前进，解放尚未解放的两万万的人口，这是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向。因此尽管部队文艺工作者要求提高，也有可能一部分回来受训练，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甚至开始还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个人要求就要服从全体的利益。解放区地方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样，也可能从老解放区调到新区去工作，去组织那个地区的文艺部队，推广那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这也是文艺与政治的一种结合。

今天要把事情的困难估计多一些，在什么困难条件下都能工作，那样，将来好一点当然更好了。我这样说，就是为了大家精神上有准备。

最后一个问题，是组织问题。因为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



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这是群众团体方面。

同时，新政治协商会议将要产生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在这个政府机构之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个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因为这个部门是为我们广大人民及群众团体服务的，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同时又是由上而下的人民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文艺界也要关心这一方面的工作，也要推出代表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在部队里，有的一个野战军多到八千多人，有的很少。当然这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各自发展的结果。地方上也是这样，有的一个县有一个文工团，有的没有。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还会继续，但是城市和乡村，部队和地方，慢慢地调整是需要的。尤其是新区，我们要派出大批的人员去。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朋友，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在反动派的统治下有空隙就要钻进去，控制它一块，被压迫就藏起来。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的国家，要自己来安排。所以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

这是在文艺方面我想说的几件事情，提供诸位研究参考。

同志们！朋友们！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



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

在全国接近于最后胜利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七百多位代表能够有这样的大团结、大会师，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 军委关于我军进占赣南的部署 给华南分局等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华南分局，方魏朱<sup>〔1〕</sup>并告四野，三野：

午江电悉。（一）同意你们的部署。（二）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究竟何时可占赣州及赣南各县，现尚不能确定，大概九月或十月是可能的。（三）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请三野转知叶飞张鼎丞诸同志注意。（四）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力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援。（五）请三野令叶飞电台与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电台（现在梅县）接通联系，请四野准备于八月或九月间令接受进占赣南任务之我军与方方台接通联系。（六）方方、魏金水午江电即转发三野、四野知照。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军 委

午佳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 注 释

〔1〕指朱曼平。



##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毛 泽 东

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的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们早就不相信它能办好铁路。在辛亥革命前就想修筑成渝铁路，并在辛亥那年闹过保路风潮，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条铁路国民党政府只修了很短的一小段。这就说明靠国民党政府要办好铁路是不可能的。我们跟它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恢复铁路和建设好铁路。过去，我们是无产阶级，什么“产”都没有，怎么能修建铁路呢？今天，我们个人没有“产”，但我们有了国家，有了群众，有了干部，有了工程师……，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

---

<sup>\*</sup> 这是毛泽东对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二十二年以前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就到井冈山上，成立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人很少，枪也很少。开始时，大家都说不行，国内外敌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是“匪”。匪者非也，就是说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四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行不行呢？行得很。拿铁路来说，我们也要和国民党比一比，看谁把铁路办得好，是国民党办得好呢，还是我们办得好？这在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我相信，大概一年左右，特别是在东北，铁路事业就可以走上轨道了。将来我们再逐渐改进和发展，一定能在全国把铁路办得比国民党好。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但同时也要依靠各级领导，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我们两者都要依靠。

我们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了。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蒋介石有那么多军队、大炮，工人也比我们山沟里的工人多得多。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



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我姓毛，我只一个人，要当班长是不行的，要当司令更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我在这会议上向你们提出，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和重视群众，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 公报（第一号）

——消灭敌军兵力及缴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新华社北平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三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第一号公报——消灭敌军兵力及缴获总结如下：

（甲）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战绩

（一）歼敌营以上部队，正规军：一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三个兵团部，三个绥区司令部，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六十个军部，一百七十八个整师，九个师部，一百三十三三个整团，一百一十九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万一千三百六十人，毙伤其四十七万六千三百五十人，合计一百九十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人。非正规军：三十五个整师，四个师部，一百一十五个整团，一百零二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人，毙伤其九万五千二百六十人，合计四十八万七



千九百一十人。

（二）敌军投诚部队，正规军：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七个整师，十个整团，八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人。非正规军：三个整师，二十八个整团，十九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八万一千四百一十人。另敌海军反正之舰艇三十二艘。

（三）敌军起义部队，正规军：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三个军部，十六个整师，五个整团，十一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人。非正规军：一个师部，十四个整团，四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一万六千零八十人。另起义飞机十九架，舰艇二十九艘。

（四）接受我军改编之敌军部队，正规军：一个战区总部，二个兵团部，十个军部，二十九个整师。共二十四万一千人。非正规军：三万人。

（五）以上四项合计，敌军共损失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六个兵团部，三个绥区司令部，二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七十七个军部，二百四十个整师，九个师部，一百四十八个整团，一百三十八个整营。以上除军以上指挥部独立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三百零三个师又二个团二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二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人。非正规军：三十八个整师，五个师部，一百五十七个整团，一百二十五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三百零七个团又一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人。总计敌军损失三百零五万人，内被我俘虏一百八十三万四千零一十人，被我毙伤五十七万一千



六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人，起义者十三万零六百人，接受改编者二十七万一千人。

（六）向我投诚及被俘毙敌高级军官七百一十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四名，内正规军一百零六名，非正规军二十八名；被俘虏五百六十二名，内正规军四百九十三名，非正规军六十九名；被击毙十四名，内正规军十三名，非正规军一名。

（七）缴获：大小炮三万八千一百六十六门，计榴弹炮四百一十九门，野炮四百零七门，山炮一千一百五十八门，加农炮二十七门，高射炮一百五十五门，平射炮七十三门，战防炮七百七十七门，步兵炮二百四十五门，机关炮一百四十二门，重迫击炮六百三十四门，轻迫击炮五千三百九十六门，六零炮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五门，五零小炮四千八百三十六门，火箭筒一千二百零一个，掷弹筒八千六百零四个，其他炮一百零七门，枪榴筒七千七百五十五个，火焰喷射器一百五十三具；各种机枪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挺，计重机枪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四挺，轻机枪七万六千二百九十七挺，手提冲锋机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五挺，高射机枪一百零九挺；各种枪支一百零七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支，计步马枪一百零一万九千七百九十四支，短枪五万三千一百三十三支，战防枪三百九十支；飞机一百二十一架（包括起义的十九架在内），舰艇八十九艘（包括起义、反正之六十一艘在内），坦克四百六十四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汽车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八辆，机车八百一十四辆，马匹六万六千一百三十八匹，电台一千六百六十部，报话机三百五十二部，电话机一万四千六百零五部；各种子弹二亿三千八百九十二万零一百发，各种炮弹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发，手榴弹二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二十枚，炸药一百一十万零二千二百七十斤。另击毁飞机三十一架，坦克七十九辆。



## （乙）解放战争三年战绩

（一）消灭敌营以上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七个兵团部，三个绥区司令部，四个整编军部（内三个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一百零六个军部，三百三十六个整师，二十二个师部，三百三十八个整团，四百七十五个整营。除军以上指挥部独立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四百九十五个半师。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四百一十五万零六百五十人。非正规军：五十五个整师，六个师部，四百零五个整团，三百五十一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六百六十三个团又三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万零七百五十人。总计共消灭敌军五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人，内俘虏三百四十六万四千零一十人，毙伤其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人，起义者十七万五千八百人，接受改编者二十七万一千人。

（二）向我投诚及被俘毙敌高级军官一千一百二十八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四名，内正规军一百零六名，非正规军二十八名；俘虏九百二十七名，内正规军七百二十八名，非正规军一百九十九名；击毙六十七名，内正规军四十五名，非正规军二十二名。

（三）缴获：大小炮六万零七百三十一门，枪榴筒一万零五百一十三个，火焰喷射器一百九十七具，各种机枪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六挺，各种枪支二百万零五千六百二十七支，飞机一百三十四架，舰艇一百二十三艘，坦克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汽车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辆，机车一千零一十三辆；各种子弹三亿七千九百四十万零八千四百发，各种



炮弹三百一十一万零一百二十发，手榴弹三百零四万四千七百四十枚，炸药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斤。另击毁飞机一百六十九架，坦克一百五十六辆。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 公报（第二号）

——解放国土面积、人口、城市及铁路统计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新华社北平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三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第二号公报——解放国土面积、人口、城市、铁路统计如下：

（一）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万零七千六百方公里；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七万七千方公里。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面积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八百方公里。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九十六万二千八百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点八七。

全国三十六个行省（以解放战争开始前旧区划为准，包括西藏地方在内）中，全省解放者有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兴安、吉林、辽北、安东、辽宁、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十七省，大部解放者有陕西、湖北、浙江等三省，一部解放者有绥远、宁夏、甘肃、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七省。



（二）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人口一亿一千一百一十六万人，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人口一亿四千三百二十万零七千人。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人口一亿三千六百零六万七千人。解放区现有人口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七万四千人，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七七。

（三）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县以上城市（以解放战争开始前敌人原有的为准，以下同）四百八十二座，重要港口及市镇七座；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县以上城市五百九十七座，重要港口及市镇十一座。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县以上城市四百六十四座，重要港口及市镇三座。解放区现有县以上城市一千零六十一座，重要港口及市镇十四座；解放区现有县以上城市，占全国县以上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一。

解放区现有一千零六十一座县以上城市中，内特别市九座（即北平、上海、青岛、南京、汉口、西安——兼省会、天津、沈阳——兼省会、哈尔滨），占全国原有十一座特别市的百分之八十一一点八；省会二十一座（即北安、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海拉尔、吉林、四平街、安东、沈阳——特别市兼、承德、张家口、保定、济南、太原、西安——特别市兼、开封、合肥、镇江、杭州、南昌、武昌），占全国原有三十六座省会（包括一个地方首府——拉萨）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三；重要海港十二座（即安东、营口、葫芦岛、秦皇岛、塘沽、烟台、威海卫、青岛、连云港、吴淞、宁波、温州），占全国原有二十五座重要海港的百分之四十八。

（四）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铁路八千八百三十五公里，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铁路一万一千五百零三公里。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铁路一万零一百七十九公里。解放区现有铁



---

路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二公里的百分之八十点五三。解放区现已通车铁路为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五公里，占全解放区现有铁路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六。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 公报（第三号）

——敌我兵力消长及损失比较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新华社北平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解放战争三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第三号公报——敌我兵力消长及损失比较如下：

（一）解放战争开始时，敌军全部兵力为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一百二十万人，敌我相比较为三点五八比一。解放战争第一年度末，敌军全部兵力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一百九十五万人，敌我相比较为一点九一比一。解放战争第二年度末，敌军全部兵力为三百六十五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二百八十万人，敌我相比较为一点三比一。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末，我军全部兵力为四百万人，敌军全部残余兵力为一百四十九万人，我与敌军相比较为二点六八比一。

（二）解放战争第三年，我军负伤三十九万七千四百人，阵亡九万二千六百人，伤亡共计四十九万人；被俘二千六百



人，失踪十二万九千四百人，总计全年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六十二万二千人。

（三）解放战争第三年，共毙伤敌军五十七万一千六百一十人，我军伤亡四十九万人，敌我伤亡相比较为一点一六比一。解放战争第三年，共俘虏敌军一百八十三万四千零一十人，我军被俘二千六百人，敌我俘虏相比较为七百零五点三八比一。解放战争第三年，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六十四万四千三百八十人，我军无此项损失。总计解放战争第三年中敌军共损失三百零五万人，我军共损失六十二万二千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比较为四点九比一。

（四）解放战争三年，我军共负伤九十八万九千七百人，阵亡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人，伤亡共计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人，被俘一万零四百人，失踪十八万八千九百人，总计三年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

（五）解放战争三年，共毙伤敌军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我军伤亡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人，敌我伤亡相比较为一点二四比一；解放战争三年，共俘虏敌军三百四十六万四千零一十人，我军被俘一万零四百人，敌我俘虏相比较为三百三十三点零七比一；解放战争三年，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六十八万九千五百八十人，我军无此项损失。总计解放战争三年中，敌军共损失五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人，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比较为三点九七比一。

（六）解放战争三年，我军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内，伤亡占百分之八十六点零九，被俘占百分之零点七三，失踪占百分之十三点一八；敌军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内，伤亡占百分之二



十七点零二，被俘占百分之六十点八六，向我投诚、起义及接受我改编者，共占百分之十二点一二。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 军委关于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 追歼白崇禧部给林彪等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

—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sup>〔1〕</sup>：

十四日二十时电悉。

(一) 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

---

\* 这两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



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军 委

午铎

## 二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陈饶粟<sup>〔2〕</sup>：

午铎电谅达，兹补充数点，请你们连同午铎电一并考虑电复。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



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sup>〔3〕</sup>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 委

午筱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 释

- 〔1〕指邓子恢、萧克，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 〔2〕指陈毅、饶漱石、粟裕。
- 〔3〕指马步芳、马鸿逵。



# 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

第一条 为根绝烟毒流害，保护人民健康，厉行禁烟禁毒，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烟毒，系指鸦片烟及吗啡、高根、海洛英（料面）、金丹或其化合质料等毒品。

第三条 严禁种植鸦片烟苗（罌粟），违者烟苗铲除并处罚之。

第四条 禁止私存鸦片烟土及其它毒品，违者烟毒没收并处罚之。

在本办法施行前农民私种鸦片所留存之烟土，应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之限期内，悉数交公，政府得视其具体情况予以一定之救济，逾期不交经检举查获者，依本条前项之规定处理之。

第五条 严禁烟毒之制造、买卖及贩运。违者，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没收，并严行惩办之。

在本办法施行前，从事前项违法营业者，应立即停止该项营业，并向所属地区之公安局或区人民政府报告登记，交出所存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并具结永远不作此违法营业，政府可予从宽处理，其不自行报告登记经检举查获者，依前项之规定处理之。



第六条 严禁烟毒之吸食及注射，违者，烟毒及吸食注射烟毒之器械用具没收，并分别处罚之。

在本办法施行前染有烟毒嗜好者，统限于三个月内向当地公安局或区人民政府报告登记，并具结限期戒除，其不依限自行报告登记或不依限戒除经检举查获者，依前项之规定处理之。

戒除期限由当地政府视染有烟毒嗜好者之年龄、身体及嗜烟嗜毒程度分别确定之。

第七条 严禁烟毒入口，违者，烟毒没收，并严行惩办之。

第八条 禁烟禁毒工作之执行，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并着重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协助办理，公安部门负责检查之。

烟毒较重之县市得设立戒烟所办理戒烟事宜。

第九条 凡科学上医药上所需之麻醉药品之原料，统由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核准配售，其成品之制造销售须经省以上卫生机关之检查化验批准。

第十条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华北人民政府随时修改之。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六年第四期刊印。



## 军委关于对程潜等宣布起义后的方针给林彪等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

林邓萧赵<sup>〔1〕</sup>：

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悉。

(一) 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sup>〔2〕</sup>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

(二) 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三) 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如何望复。

军 委

十八日下午四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注 释

〔1〕指邓子恢、萧克、赵尔陆。

〔2〕指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



# 刘少奇、高岗、王稼祥 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会谈情况 给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

中央、毛主席：

（一）在我们将书面报告及若干材料送给联共中央斯大林以后，午真晚十时联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开会，我们及柯瓦洛夫参加，师哲翻译。到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甘诺维赤、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另列席索柯洛夫斯基，参谋总长，海军元帅。首由斯大林说明几个政治局委员已去休养，另有几个军人参加，因中国代表团报告中提到一些军事问题。斯大林首先问我们：海军中有无自己的军官？空军中有无自己的飞行员？各省有无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的政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人员？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怎样？又问什么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当我们答复了上述各项问题之后，斯大林即展开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说明，并答解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问



题，最后在我们请求之下对目前国际形势亦有所说明。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会后，斯大林并问我们生活是否舒适，由所有到会人员和我们一起看电影，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影片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解释。

（二）在会议中组织了一个借款条约的共同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柯瓦洛夫参加，中共方面由我们三人参加，并决定借款条约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因这样对联共在手续上较为适合，便于联共将条约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关于斯大林对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及当时口头提出的各项问题之答复，综合报告如下：

#### A. 关于中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那些国家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的关系。中共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订一种对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使帝国主义廉价的商品不能在中国倾销，



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使青年的国家工业也可逐渐发展起来，这是两利的。俄国十月革命时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私人资本家的企业，故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政策，在中国，目前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很困难的，而应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罢工会要发生，我们暂时不要扩大劳资斗争，但工人斗争可能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发生困难，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的继续。

#### B.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

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在我们答复中央政府的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的问题之后，斯大林说：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在我们答复各区域（例如东北）及各省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权力批准和撤换各区域及各省选举的政府负责人之后，斯大林说：你们目前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的观点，是对的。其意就是说，在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条件之下，不要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但斯大林很注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裂现象之可能发生。又，我们在报告中没有提到买办资产阶级，斯大林问到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似乎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 C. 关于外交问题

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所说的几项外交原则，是对的。



这些原则就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斗争，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合作，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与各国特别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及企业，斯大林说：可以用劳动法，要各外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关于是否要争取各帝国主义国家早日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 D.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关于中苏条约，他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关于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斯大林说，你们可以与东欧各国谈判，苏联可以帮助，但最好你们直接谈判。并说：捷克以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可以供给你们商品，帮助



你们，你们可以勇敢地和他们谈判。关于联共与中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密切两党的联系，是对的，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一种联系。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即可以来，如毛还不便来，苏联可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 E. 其他问题

1. 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说：因为在新疆无着陆场，空运军队到新疆，还无办法，至于派战斗机帮助打马家<sup>①</sup>骑兵，那很简单，可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开始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在看电影时，斯大林说：在二次大战中骑兵作用不大，因骑兵怕飞机，目标很大，很易被打散。

2. 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可要东北与大连苏联同志商量解决。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3. 我们曾要求在莫斯科办一中国大学，收学生一千人以下，为中国训练建设与管理人才，斯大林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4. 斯大林自己提出从外蒙库伦建筑铁路到张家口（因安得列夫在西柏坡时有人提出此议）问题，他说：这是好事，可以办。我们问：可否建立一条铁路由陕西经新疆到苏联？斯说：太长，不如先建立油管要便宜三倍。斯大林又说：你们如果有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其他植物油，我们都需



要。并说：你们要扩大棉田，提高棉产，为此，你们要逐渐使用农业机器，才好提高棉产。

5. 斯大林说：可以帮我们在旅顺办一海军学校，并帮我们建立海防。斯大林又问我们，苏联是否可派电影团到我们前线帮我们拍照？他们在电影技术上可帮我们。我们答复可以，并说曾有一电影团到林彪司令部。斯说：因他们在那里搞得不好，我们撤回来了。我们说请再派去，可以把关系搞好。斯说：他们拍照影片的内容，可完全依照你们的意见办。

（三）关于国际形势，在我们提出问题后，斯大林答复如下：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主要一点，就是会不会爆发战争？从国际间的各种条件看，即从经济条件，从美国对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对战争尚未准备好）来看，现在与苏联进行战争，对帝国主义者是不利的，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说，目前不应该有战争。但历史上有冒险家，有精神失常的人，所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仍是有的。我们对此有准备。目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不足，他们正在进行准备，他们并用原子弹来恐吓，但我们也在准备，我们比他们准备得更快些。

有的冒险家、精神失常的人宣传说：苏联军队要在美国登陆；另外一些人也就相信这种说法，所以可能产生冒险家的。例如美国的国防部长福来斯特尔，他虽然死去，也还可能产生这种人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除外的。

我们问：苏联与英美之间目前存在的各项重要问题是否可能获得妥协的解决？斯大林答复说：这是很难的。若干次要问题可能解决，而重要的问题则很难解决。待以后再看。

我们现在对反动派是进行着孤立他们的政策，用各种群众团体、各种会议，在各国、同样也在美国，进行揭露和宣传斗争，其作用很大，以后还要继续这样作。



今天美国政府及其政策，是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美国有些人想与苏联搞好关系，但他们不当权。美国将来如有新的政府、新的政策，也许美苏关系可以改善的。

马歇尔计划已经破产，美国在德国的影响已缩小，自己污辱了自己，战争的可能性在那里已缩小。

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就打，他们使用原子弹，我们也使用原子弹。

美国人自己并不想打仗，总想用别人的手替他们打仗，他们也公开地这样说，但愿意替美国流血打仗的人并不多。

总之，我们既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

刘 高 王

午巧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刊印。

## 注 释

〔1〕指马步芳、马鸿逵。



##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邓 小 平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推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

\* 这是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信的节选。信中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口头指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 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张 闻 天

根据几个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我认为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大体已经结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二时期。

大体上说来，从八一五解放到全东北解放（实际时间可算到今年三月），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东北私人资本从日帝的殖民地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的过渡时期。

伪满时期，东北私人资本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政治上是大汉奸大特务，在经济上是掌握大加工业、大配给店的大资本家大商人，在农村中往往又是大地主。这是伪满时期的一种汉奸资本。这一部分资本依靠日帝政治与经济的势力，与日帝资本结成一体，为非作恶。其资本较大，势力较大，但人数不多。另一部分是中小资本家，特别是小资本家，虽也依附于日帝资本为生，给日帝加工，做些零件小玩意，或执行配给任务，但经常受到日寇的压迫，特别在日寇实行经济统制（伪康德七年即一九四〇年）后，受到的打击很大，故对日寇不满，同汉奸资本亦有矛盾。这一部分资本数量较多，但力量

---

<sup>\*</sup> 这是张闻天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报告。



很小，在日帝经济统治下，只能苟延残喘。

八一五解放，伪满殖民地经济体系被摧毁。过去依附于这一体系的汉奸资本，同时也受到了应受的惩处，没收的被没收了，破坏的被破坏了，有的为逃避目标，化整为零了。但中小资本家，却得到了解放。这三年余来，东北的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虽然经过了许多曲折，但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一般地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应指出，在过去这一过渡时期内，私人资本主义是在一种比较不正常的条件下发展着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是战争时期。东北被分成许多块，南满几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还在敌人手里。由于战时财政的不敷出，物资的缺乏，故物价总是不断上涨，特别从一九四八年夏季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物价表现极不平衡。由国家没收过来的公营企业，这时正在恢复，生产量又低又少，还发挥不了调节市场的作用。国家对私资的发展，除土改后期的一个短时间外，一般是比较放任的。虽然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了对于私商的某些限制与管制，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平抑物价与反对投机倒把的措施，但作用不大。在这样条件下发展着的私资，大部分要利用物价的波动与不平衡来进行商业活动，那是很自然的。这部分商业资本，固然也解决了国家与人民的某些需要，但同时它却大大地发展了投机倒把的活动。商业利润是特别的高。商业资本从国家与人民手中发了很大的财。如果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的活动，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活动，那也是不算过分的。至于另一部分工业资本，则主要地为国家加工而获利，尤其以军工军需的加工为多。有的则为一时一地市场的需要，制造一些日用必需品出卖。工业的发展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游击性的，抓一把的，大多数是小型的。有原料、有销路，就生产开工；



没有就另想办法。看到投机有利，就去参加投机。为避免目标太大，避免税收负担，及为适应市场的迅速变化、力求资金周转的迅速与灵活起见，较大的工厂与商店，均走向分散而“化整为零”。小手工工厂与作坊，特别是行商、摊贩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各地工商业户数的增加，研究起来主要地也就是这种小商店、行商、摊贩及小手工工厂及作坊的数量增加。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了投机倒把的发展。显然，这是循着无政府的老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运动，到今年三月可以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当时在我们同志中间，曾经有过这样的错误思想，以为这就是发展工商业的主要方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小资本的要求在党内的反映。但东北局当时的方针（见去年九月高干会《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是全力恢复控制经济命脉的国营工业与商业。因为它懂得只有加强国营经济的力量，才能在经济上巩固我们的政治与军事的力量，反对私商的投机倒把，给私人资本主义以经济上的领导，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全东北解放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停止了。全东北和平统一了。东北大军的进关，使财政收支的平衡成为可能了。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大城市全部收复后国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与扩大，大量物资可用之于调节市场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力量增强了。物价开始达到平衡，有的甚至下降了。国家在经济战线上开始取得了主动，加强了计划性。天津、上海的相继解放，使东北市场同关内市场联系起来。这些都对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的影响。商业投机困难了。军工军需的加工定货减少了。价廉物美



的东北大城市的本地工业品及关内来的工业品，进入东北内地市场来，同本地货竞争了。许多原料的来源，还不够发展着的国营企业的需要。物价、原料与市场的条件，都起着不利于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巨大变化。虽然大部分商业资本还在盲目地待机与挣扎，到处找空子钻，但一部分商业资本却看到了自己暗淡的前途，而想转入工业生产了。有的工厂与作坊，如像安东之棉织业、造纸业等，因缺乏原料而无法进行经常的生产；有的，如像安东的铁工业、丝织业等，则虽有原料，但没有市场，而不敢进行生产；有的虽有原料市场，但成本贵，不能同国家的、大企业的及外来的成品相竞争，也不敢进行生产。大部分私人工商业同过去比较起来，现在开始表现出了停滞与萧条的状态。有奖实物公债的推销，银根的紧缩，对他们商业活动的严格管制，又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一切这些在私人资本家的头脑中，造成了惶惑与混乱。私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物价如何？原料如何？市场如何？国家意图如何？成为每一个资本家所要解答的严重课题了。

这些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加以解答。于是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从第一时期转入第二时期。带有极大自发性的比较“自由发展”着的私人资本已经面临歧路，他们现在如果不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所铺设的轨道走去，就不能求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了。显然，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与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那今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全与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如此，我们也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积



极性，使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服务。至于私人资本的一切越轨活动，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关于今后发展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与办法问题，我们必须从东北经济建设计划的全局着眼，加以根本解决。我们必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章。我认为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体上已经具备。

为了给私人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办法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我认为具体检讨一下过去我们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各个方面，是有必要的。

在三年余来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右摇摆。在我们开始进入东北时期，在党的总的领导方针上虽然是右的，但在城市内实行了反奸清算的地方，在打击汉奸资本时，有时也扩大了打击面，把不应该打击的某些中小资本家打击了（强调了东北私人资本的汉奸性）。在多少进行着工人运动的地方，也有个别增加工资过高的现象。虽然这种情况当时并不严重，甚至相反地，在解决当时财政困难问题上，在迅速争取工人贫民靠近我们上，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从私人资本那里抓一把的思想及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是有的。较大的私人资本的转移及其“化整为零”，同我们当时的这些作法，也是有些联系的。七七决议后，全党转入土改，对私人工商业一般采取了放任的与不侵犯的方针，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得到了若干发展。但到土改后期，农民进城没收清算工商业者的封建性，有些政府机关与部队从财政观点出发，从工商业方面抓了一把，街道斗争中的工人贫民，也从中侵犯了一部分工商业。这给了私人资本家，尤其是较大的私人资本家，一个比较严重的打击（在



安东当时受到影响的，占全部工商业户数的百分之十六，其中较大的私人工厂被没收的比例更大）。这是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时间短，纠正快，纠偏后私人资本又得到了恢复。以后物价的飞速上涨，促进了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商业方面的特殊繁荣。纠偏后，在干部思想中曾经发生过过分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忽视了发展国营企业的迫切需要，忽视了同私人资本家在商业上的投机倒把作斗争的必要，及片面强调了保护资本家而忽视了依靠工人的一些右的观点。在中央与东北局“纠偏必须防右”的方针下，这些右的观点迅速得到了纠正。自此之后，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一般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也仍然是有的，尤其在防右后的“左”的偏差。为了进一步发挥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纠正一切这类偏差，尤其是“左”的偏差，今天极为必要。

我认为目前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些“左”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一些方面。

第一，在公私兼顾方面。原来强调国家的利益及国营企业的利益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侵犯了正当的私人工商业，那就不对了。而这样侵犯私人工商业的事，还是不少的。特别是有些财经部门、财经机关，为了本部门或本机关的利益或便利，而损害了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这类事件是比较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最近所检查的本溪县三仁石灰窑的故事，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公私合办的企业内，这种只顾公方利益不顾私方利益的事也不少（关于这类的材料见另件）。

第二，在劳资两利方面。原来在城市工作中强调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发生片面的



工人福利观点，因此损害了劳资两利的原则，那就不对了。而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省委关于调整劳资关系决定草案）。

第三，在税收政策方面。（这个问题原来是公私两利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但这里特别提出是有必要的。）原来给工商业者以一定的税收负担以解决国家财政的收入，那是正确的。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商人投机倒把的活动，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为了税收，给工商业者的活动以过多的过分的干涉与限制，那就不对了。在一些同志中，尤其是在税收机关工作的同志中，培养税源的思想太少，而“杀鸡取卵”的思想有时甚至还有表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太少，而限制的思想却多了些。这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很不利的。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以上这些“左”的偏差，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在东北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程度认识不足。东北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重的悬殊，国营企业在工商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这一明显的事实，往往容易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私人资本无足轻重的思想。同时领导机关过去差不多集中全力于恢复与组织国营经济成为计划经济，因而对私营经济的注意不能不有所放松。过去物价波动时期，私人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投机倒把活动，给我们困难很多，损失很大。这些明显的突出的事实，也容易使我们过分强调私人资本的投机倒把的破坏方面，而忽视了它在我们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下，可以发挥其积极建设的方面。这也就使我们容易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方面，而对积极扶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注意不够。其他如片面的国家观点，片面的财经观点，片面的群众观点，也常常容易侵犯到私人资本的利益。而这种观点，常常是较之右的观点更加难于克服的。在党内，“左”比



右要好”的残余思想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所以在干部中就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坚决贯彻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营经济的建设多少有了一些头绪，私人资本又陷于这样的一种困难情况，党的领导机关更多地去注意于积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作，也是可能的与必要的了。

当然，在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也仍然是有的，而且在批判一些“左”的思想与做法中，右倾思想一定又会乘机抬头。但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哪里发生右倾思想，我们也就能在那里加以纠正，不用害怕。为了正确贯彻中央、东北局关于私资的方针，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去克服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是必要的。说“‘左’比右好”是错误的，说“左”比右难于克服些，因而“不妨右一点”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

以上看法，是否有当，请指示。

关于本省直属各市的材料，有的照原来报告，有的经研究室同志略加整理，现在一并附上，供你们参考。

关于调整劳资关系问题，我们写了一个决定草案，已寄上请批示。

此外，我们还想写一个关于公私兼顾问题的文件，待写好后，再寄上请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 毛泽东关于争取卢汉起义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

据张表方<sup>〔1〕</sup>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sup>〔2〕</sup>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注 释

〔1〕 即张澜。

〔2〕 指蒋介石。



## 毛泽东关于举行平凉战役 及西进作战意见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德怀同志：

午寄电<sup>[1]</sup>悉。打胡<sup>[2]</sup>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sup>[3]</sup>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sup>[4]</sup>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sup>[5]</sup>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订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



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 泽 东

午 梗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 释

〔1〕指彭德怀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一）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约五万余人。（二）为解放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请向某方订购汽车一千至二千辆，供西北军用。（三）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退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十个军，二十六日开始攻击。

〔2〕指胡宗南。

〔3〕指马步芳、马鸿逵。

〔4〕指苏联。

〔5〕即刘少奇、王稼祥。



## 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朱 德

同志们：

自从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和全国总工会成立以来，工会工作在各地都有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基本上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今天，召开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工作会议，其意义与任务是很大的。

(一) 首先，我们要认清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获得解放，工人们自己也深切体验到他们自己是解放了。他们已不是被统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新民主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职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他们已不再受人剥削，已不是为资本家做工，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自己做工了。因为，国营企业是国家的，是人民的，首先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但这些企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只能依照以工人阶级为

---

\* 这是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规定的轨道运转。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在经济上要自觉地接受劳资两利的政策。这种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建设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此目的，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领导工会工作。否则，我们会陷入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的泥坑，我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正确地组织并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在现阶段，在政治上，工人阶级要联合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中国经济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正因为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服务。我们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之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向着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民生计的方向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记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



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

（三）因此，工人阶级在国营企业中应该是面对着生产，学习经营，学习管理，提高政治，提高文化。国营企业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营企业的行政管理干部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者之间完全不应该有矛盾。目前所存在的若干不协调的现象，其来源或者是由于工人中的经济主义倾向，或者是由于行政管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国营企业中的工会，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应该看做工会内部一部分会员的思想倾向，批评教育纠正之。国营企业的工会，由于反映了落后工人的经济主义倾向，而和行政管理干部对立起来，固然是错误的；就是为反对行政管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而采取对立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干部应当重视工会工作，尽可能支持工会工作，提高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要知道新民主主义的管理生产与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对工人的强制压迫，我们是依靠工人的自觉。因此，管理民主化与行政干部的民主作风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必须把工会工作搞好，才更易于实现管理民主化，来动员全体职工的自觉劳动热忱，提高生产。总之，在国营企业中，代表国家管理生产的行政管理干部，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工会工作干部，都是工人阶级。他们的任务是一



致的，就是搞好生产。这是国家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

在私营企业中，是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工资、无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者的路线，是落后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也必须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并在生产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要实现劳资两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监督是不够的。资本家是有种种办法力求克扣工人、加重剥削的，要经过工人一定的适当的斗争，才能实现劳资两利。在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斗争中，工会应该是坚决代表工人的。

（四）这是不是说，工会不应该争取工人阶级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与工人福利呢？不是的，党和工会，首先是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工人阶级之最低生活，并争取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但是，工人阶级生活之改善只有在发展生产中才有可能。现在，许多大中小城市已经解放了，我们除了保障工人最低生活而外，一般并不能使之有多少改善（当然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是根本改善了，解放了，自由了）。因为，第一，旧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其“繁荣”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经济的“繁荣”，是建筑在封建剥削基础上搜刮农民膏血的“繁荣”，要把这种城市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生产的城市，一般是要有一个相当过程，目前正处在转变的过渡时期。第二，十数年来的战争破坏，再加过去是革命的乡村包围反革命统治的城市，乡村封锁城市。现在城市解放了，要建立新的城



乡互助的城乡关系，要恢复多年来被破坏了的城乡经济联系，也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目前正处在这种转变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两大原因，目前许多新解放城市的工业生产，恢复和维持已深感困难，发展更谈不到。许多国营企业是在国家津贴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许多企业因为生产成本过高，根本不能与外货竞争，目前是在实施某种出入口统制的条件下继续生存着。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是要保证的，但是，除了保证工人的最低生活、说服教育工人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以外，如何还能提高待遇、增加工资呢？当然，有些地方，如东北，情况比较好些，工人生活也可以在可能范围内稍加改善。但是，也应注意到，某些在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特殊利润，那并不是正常状态下的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这种特殊利润，应该以税收形式收归国家，用以支援战争，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绝不应该成为资本家的利润，也不应该用以增加工资改善部分工人的生活，使之过于突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中纺公司所实行的一套办法，使中纺工人的工资突出地高，那是收买部分工人，分化工人阶级团结的办法，我们绝不应该采取。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尽可能改善工人生活。事实上，生产发展了，人民的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工人生活也就随之提高了。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那是倒果为因的。不注意发展生产而斤斤于改善工人生活，那是自杀的政策。

总之，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为着支援当前尚未结束的解放战争，需要发展生产，为着建设新中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业。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



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中，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在国营企业中则更应该是团结全体职工，克服官僚主义，完成生产任务。

其次，工会还应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学校，它是学习管理生产的学校，也是工人阶级实施阶级教育的学校。

最后，工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柱，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党的工业政策、工业计划与工资政策、劳资关系的政策，都是经过工会而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并由工人群众实现之。所以，在工会中工作的同志，要努力使工会成为党联系工人群众，在工业领域中、在工人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

今天我只讲这一点，供同志们在讨论中参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 军委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 行动计划给林彪等的指示<sup>\*</sup>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sup>[1]</sup>及方方：

各电均悉。(一) 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二) 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三) 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这个会议的时间应不迟于九月五日，请方方按时赶到赣州。林平<sup>[2]</sup>及其他什么人应到会，由方方决定。方方须提早结

---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束闽粤赣边区工作的处理。(四)江西省委对接收赣州及赣南各县的准备工作,须迅速完成。(五)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六)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七)以上请林邓萧赵将有关各点,通知陈赓、邓华及江西省委。

军 委

午敬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 释

〔1〕指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

〔2〕即尹林平。



## 严厉取缔投机活动 保持物价平稳！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平津两地物价，自四月下旬发生的一次波动，经我国营贸易机关大力平抑后，五六两月份，各货价格一般是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但入七月以来，近二十余天的平津物价，又趋波动，而且上涨速度远较过去为甚，各货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半左右。以天津为例，七月二十四日与六月三十日比较，大米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小米与面粉皆上涨了两倍，玉米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棉纱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五福布上涨了百分之一百零五，棉花上涨了百分之九十八，食油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四十，此外西药、电料等价格，上涨亦猛。北平各货价格上涨的比率，亦大致与天津相等。

构成此次平津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是受上海物价上涨的影响。上海自解放以来，各货价格一般皆高于平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因此在我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江南以前，江南广大地区人民即自动拒用伪“金圆券”，改用银元作交换的媒介。银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当我军解放上海及江南广大地区时，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及时肃清银元投机，使我人民币得以很快占领城乡市场，以平稳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迅速恢



复。几月来经过我当地人民政府的各种有力措施，及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协助，在江南各大中城市中，目前已基本上肃清了银元的投机活动。但在广大的农村中，则由于我各种工作尚在初创，国营贸易、银行等经济机构，才开始建立，因之银元仍在市场上流通。遂使我人民币，集中流通于各主要城市，城乡物资交流困难，使上海等大中城市，暂时表现了通货集中和物资缺乏的现象。此外，近月来江南广大地区夏雨连绵，交通被阻，各地运往京沪的粮食等类物资大为减少，加以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等港口的封锁，使我对外贸易亦一时处于停滞状态。

基于上述情况，上海物价自六月下旬起复继续上涨。七月初平沪直达通车开始后，上海投机商人即大批携带现钞，来平津大量采购物资。开始主要是私购金银走私南运，其后即普遍囤积各种进口品及纱、布、粮食等。因之，也就造成了近月来平津物价由上海带头上涨的趋势。

其次，平津两市之投机资本，在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兴风作浪，亦为此次平津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报近月来平津两市市场上，不但私人游资大为活跃，而且我某些公营商店、机关生产及合作社，亦随波逐浪，竞作投机囤积，致形成最近几天平津物价，不但大大超过于华北内地各城市（天津七月二十三日小米价格与石家庄同日比较约高一倍），而且高于上海。

再次，最近华北各地雨水较大，交通受阻；加以广大农民怕受水灾秋收减产，因之不愿继续出卖手中所存的农产品，亦对此次平津物价上涨，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

以上各点，即为此次平津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对稳定当前物价，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严厉取缔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尤应首先惩罚某些公营商店的投机活动。公营商店有协助政府平稳物价的责任，机关生产不准作买卖，不准投机倒把，我人民政府早有明令规定。但直到现在为止，有些单位仍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在此次平津物价波动中，部分公营商店，机关生产及合作社，不但不大力协助我国营贸易机关抛售物资平抑物价，相反的只顾其小集团少数私人的利益在市场上与投机私商暗相勾结，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抢购物资违法囤积，操纵物价。此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恶劣行为，是我人民民主政府的法纪所不能容许的。从思想上讲，纯粹是一种腐朽的可恶的资本主义投机思想。希望政府迅速进行检查，严厉制止公私商号的各种投机活动。

第二，上海的领导机关，最近已在大力平抑物价，并已收到成效。对上海平抑物价的工作，我华北广大人民必须照顾整体利益，积极支援，帮助上海及江南人民来克服这种暂时的困难。回忆平津初解放时，同样也曾发生过连续的物价波动。那时不但华北各地人民，且连华东、华中、东北与西北各解放区人民，均曾用大量物资来支援平津，使平津的物价得以恢复平稳。今天上海所处情况，正如平津初解放时。我们华北人民，也应当用大力来支援上海及江南新解放区，使上海的物价亦能恢复并保持平稳。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如果上海的物价不平稳，我华北及平津的物价断难单独保持平稳。所以主动调剂物资支援上海，实际上也就是保持平津物价平稳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我国营贸易机关，在此次稳定物价工作中，除严厉打击投机活动外，必须同时大量调剂物资，用经济的力量来恢复平津物价的平稳。对于上海涌来平津的游资，如果他们采购



物资运回上海，我们一般不应限制，但如进行投机囤积，则应同样予以惩处。同时且应争取主动，自动运送大量物资去供应上海、武汉各地市场。我们最近已运出了大量的煤炭和食盐等，去供应长江沿岸各大城市，这是主动调节各地物价，保持市场安定的最有效的措施，今后仍应继续进行。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刊印。



#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 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 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

(一) 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 自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以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项会议，这是不好的。各中央局、分局必须指示所属各城市党的组织，经过市政府，迅速召集此项会议，并以开会情形报告我们。

(三) 关于各老解放区，应当召开乡的、县的、省的及全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亦望遵照中央早已发出的决议从速办理，不要推延。党内干部中有一种不愿召开此类会议听受批评及建议的倾向，必须克服。

(四) 关于各解放区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一事，必须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一事配合举行，不可再推迟。



(五) 兹将北平市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党的代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 央

午世

## 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及党的代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甲、过去我们还只是召开了一些带有代表会议性质的座谈会，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如土地、房屋问题等。尚未召开过正式的各界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现在我们决定于剑英同志南下前，由军管会、市政府联合召开一次全市各界代表会议。

(一) 在此次会议中，除扼要报告半年来的工作外，并拟报告与讨论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继续肃清潜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及对首要敌特分子的处理问题。

第二，关于进一步恢复与发展生产问题，包括今后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及对私人企业的指导方针和继续开展城乡贸易及劳资关系调整等问题。

第三，关于本市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和管理中的若干问题。

第四，若干税收问题。

会期预定三天。



（二）关于代表产生方法。因为现在北平的工会已有九万会员；学生会有五万会员；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已正式成立；大学教联已成立筹备会；妇女、农民都已有了若干组织。因此，我们决定除各党派代表和聘请的一部分代表外，各群众团体代表拟令其自行选派。产业界与商业界的代表拟由各行业代表推选。这样与群众的联系及代表性会更好些。以现在的工作基础和情况来估计会上不至有大困难。至于代表名额之具体分配及产生方法等，俟组织草案决定后另行报告。

乙、拟于各界代表会议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讨论当前的工作计划与党务工作，并报告讨论各界代表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搜集意见加以修改和补充。会期预定两天。

关于党的代表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

（一）根据党章规定提出各级党委代表名额如下：

1. 各区区委各推选代表五名，二十一个区共选代表一百零五名。

2. 市委直属机关分党委与总支，共选代表二十五名，计：直属党委推选代表三名。

市委机关总支三名。

铁路分党委推选代表二名。

长辛店铁路大厂分党委推选代表二名。

人民银行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贸易局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公安局分党委推选代表三名。

公安总队党委三名。



公安局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公安局二处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市委干训班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3. 各学校总支共选代表十七名，计：

学生党训班党委推选代表三名。

北京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清华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师范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燕京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辅仁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育才中学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青年学习团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4. 各工厂总支共选代表十三名，计：

电信局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被服厂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人民印刷厂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机器总厂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电车公司总支二名。

(二) 根据北平市情况，领导系集中于市级。各项工作主要干部大部集中市级各机关，且多未参加各级党委。为了更便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市委所属各部委会、市政府系统各局外负责的党员干部共六十五人，拟由市委指定为代表参加会议。计：

1. 市委直属各部委会共三十三名。

2. 市府二十三名。

3. 公安局九名。



（三）青年团市工委会推选代表五名（各工厂、各学校团的负责人，可由各单位包括）。

是否妥当，请批示。

北平市委

七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出版物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各局分局、平津宁沪汉市委宣传部并转各党报各新华书店：

根据专业分工原则，并为了出版物的版本划一，及避免内容错讹、版本分歧与浪费重复，兹规定：

一、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干部读物等以书本或活页形式出版及对外发行，是解放社和新华书店的任务，今后这工作应经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统一由出版委员会及中央局一级的新华书店办理。各报社或其他部门，不宜兼做这一出版工作，对外印发。但遇下列情形可变通办理：

1. 在某地上述新华书店尚未建立，或虽已建立而无足够条件时，可暂由报社或其他机关兼理出版；

2. 学习机关因大量教学需要，可自行排印，但不对外发行；

3. 分区或中等城市，因中央局一级书店发行不到或发行不足，经区党委或市委批准，可由当地新华书店或其他部门翻印。

二、解放社及新华书店出版书籍，应不准私营书店未征得我方同意而擅自翻印，党的文件或负责同志言论在报纸发表以



后，出版权即属于解放社及新华书店，亦不准私营书店未经我党同意径自翻印。以上两点，可登报公告，但对翻印事件之处理，应着重劝告说服。

中共中央宣传部

未支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毛泽东转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的批语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同志们：

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 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 及其主要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平津解放后，遵照中央与华北局指示，采取大量招收（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差不多是来者不拒）与严肃改造



知识分子的方针，先后入学者达一万二千余人。成分很复杂，根据九千学生的统计，学生占百分之四十三，公教人员占百分之三十四，军警宪占百分之十二，工人占百分之四，农民占百分之一，商人占百分之四，其他占百分之二。全校学生的文化程度，大学生及高小生均占百分之十左右，中学生占百分之八十左右。青年（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妇女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经过入学注册，主要是深入学习后的自动坦白，以及同学检举、市内党政保卫机关的通知，先后发现全校学生中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及曾任职警察、宪兵、专业特务破坏分子、叛徒、杀人凶犯及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等合计约达两千五百人，其中绝大多数系一般党团分子，特务系统工作者是少数（约百人左右）。自动缴出手枪三十二支（已收到二十三支），因之，革大虽然最基本的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场合，但同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亦是很复杂剧烈的。

一般学生与公教人员入学时的政治态度，多为保守的中间分子状态，极少数是进步的（四部两千四百学生中只有十一个党员、六个团员），一部分是落后与反动的。入学动机很不纯，一部八个班的统计，要求进步的占百分之十三点八，追求个人目的占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糊里糊涂的占百分之十七，别有企图的占百分之七，其他各部情况大体相同。以上就是本校学生的基本情况。

（二）经过三个月的思想教育（一部分入学校早的将近四个月，一部分入学较晚的不到两个月），成效很大，思想动态已起了基本变化，极大部分已经基本上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改变了过去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现在靠拢我们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落后的与反动的约占百分